

序一

人口對於經濟的作用始終是一個謎。有人說地球上的資源有限，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地球資源所能夠容納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從微觀一點的層面來看卻正相反。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像日本、香港、臺灣，還有歐洲的許多國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見資源問題並沒有成為制約因素。再具體到城市的層面看，大家都在爭人口。十幾年前我研究美國人口的流動時發現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破落敗壞。各個地方當局都在爭人口。不但美國這樣一個相對地廣人稀的國家如此，連我國這個土地資源極其緊張的國家也都在爭人口。城市邊緣的開發區最著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樓大廈雖然都賣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榮不起來，房地產的價錢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戶人家來到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過去大城市的戶口控制極嚴，近年來情況大有改變。主管當局越來越明白，繁榮靠人口，抵制人口對自己不利，因此大大地放鬆了對戶口的管制。我國農村經濟的停滯和城市的發展也與人口的大規模湧向城市有關。當然，人口密集而又貧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總起來看，似乎二者沒有什麼確切的關係。因此人口和經濟的關係成為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特殊課題。

如果從人類發展的長遠歷史看，人口數量在近二百年間發生了爆漲。據歷史學家估計在公元零年時全球人口為 2.3 億，到 1820 年增加到 10.4 億，平均年增長率為 0.08%。而近 180 年

來人口從 10.4 億增加到 65 億，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 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長率 1975~2003 年間平均為 1.6%；2003~2005 年為 1.1%），比過去的兩千年加快了 12 倍。拿更遠的史前發展看，人類從非洲走出後六萬多年才增加到兩億多，其增長速度跟蝸牛爬行差不多。現在的人類學家想方設法尋找遠古時代的人類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時候的人類總數大概不超過百萬，分佈在全球 1.33 億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來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個人。找起來當然不容易。這樣看起來人口數量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加速的過程，而到了 20 個世紀進入到了一個爆炸階段。人口的增加遠遠超過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獨霸地球的超級物種，把其他生物的棲息地統統都佔領了，破壞了，導致其他物種的大量滅絕。現在的環境破壞和大氣變暖，輪到人類自己滅絕自己的時候了。幸虧事物有自己的規律，近年來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後人類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預見，將來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人類太多，而是孩子太少。這一現象已經在發達國家看到。中國不久也會走上這條路。經常出國的人或許會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國公園裡很難看到小孩，在公交車上很少看到孕婦。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現出徵兆。

過去以為如果人類不控制自己，照過去的軌跡發展下去，不出二三十年，因人口過剩而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結果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世界輿論發出了緊急呼籲，要控制人口，要保護環境。現在快半個世紀過去了，此間發生了些什麼重要的變化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經濟增長加速，相應的環境負擔加重，還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減慢。這三件事中國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國的變化相當典型地說明了全球在這個時期的變化。

易富賢先生的這本書是討論人口的。讓我們來看看，在全球總體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人口究竟處於什麼狀態。看了這本書我們才知道，這裡存在著鉅大的觀點分歧。觀點是政策的基礎，不同的觀點導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觀點錯誤，後果將是嚴

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結果會產生幾十年的持續影響。所以弄清楚我國的人口狀況和發展趨勢是一件重大事情。

現在全球人口是 65 億，其中中國佔了 19.5%。中國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為其他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超過中國。特別是中國每年增加的人口數在直線下降。從 1988 年年增 1700 萬人降到 2005 年年增 700 萬人，平均每年減少差不多 60 萬人。這樣推算到 2016 年中國的人口年增為零。再往後，人口增長變成負數，人口總數一年比一年減少。因此中國人口的峰值應該發生在 2016 年。從 1988 到 2005 年的 17 年看，易富賢的曲線和事實擬合得相當精確，拿來推測未來 11 年的增長是相當可信的。（見本書圖 16）易富賢得到的結論是調整人口政策，取消對生育的控制。這一點和國家計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計生委的意見，計劃生育絲毫放鬆不得，不但在現在的五年計劃裡如此，下一個五年計劃還不可以放鬆。

我不是人口學家，對上述兩種意見的是非曲直沒有發言權。作為經濟學家可以從經濟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說，人口和經濟的關係非常複雜，但是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長確實是爆炸性的，其後果是環境和資源的不可持續性。這一點意見是比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們能夠有所作為的話，我們希望人口增加，還是人口減少？或者不增不減？鑒於人口資源的矛盾，減少人口應該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這是從很長遠的發展看。從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為這裡有一個如何從人口增加變到人口減少的適應過程。變得太快社會不能適應，會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難，造成鉅大的社會痛苦。具體的問題就是人口忽然減少，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導致生產力下降，全社會入不敷出，經濟衰敗。這樣的經驗教訓已經在不少人口減少的國家裡發生過。尤其在我國，因為二十多年實施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發生過急剎車。將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比哪個國家都快，可能造成的問題也特別大。這一點是我國大多

數人口學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經濟有很大的好處，降低了家庭的負擔，提高了社會的儲蓄率。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這一份紅利是寅吃卯糧得來的，將來老齡化社會降臨時勞動力供給不足，欠賬是要歸還的。

一胎化政策導致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嚴重的性別失調。根據公佈的人口統計，現在0~4歲的性別比達到了1.23，這個年齡段的人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男性會找不到老婆。性別比的失調一年比一年嚴重。拿每五年作一個段落，性別比依次是1.23、1.19、1.14、1.08等等。可見這個問題在日趨惡化。當然，性別比失調的原因很複雜，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關。在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之前性別比沒有扭曲。

由於這些原因，繼續執行嚴格的違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懷疑的。易富賢先生的這本書對當前政策提出質疑是有必要的。有這樣質疑的人遠不止易富賢一人，但是在我國這樣一個信息流通受阻礙的環境中，這方面的意見不能充分表達的。所以他的看法特別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說，國家計生委應該對這樣的意見最關心，最歡迎。可是事實上恰好是計生委不歡迎不同的意見。其中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見干擾，得不到貫徹；更由於政府官員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如果計劃生育不需要了，國家計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這份官也當不下去了。相反，愈是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權也愈大。很明顯，什麼樣的政策對這些官員有利，這是問題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難解決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聯繫到官員們的個人利益，就能夠解釋一系列的政策偏差。類似的問題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國的糧食問題。主管糧食的官員特意強調糧食安全的重要性，無中生有地製造糧食危機論，迷惑老百姓，製造緊張氣氛，甚至哄騙最高領導人，藉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其次是保護耕地的政策和凍結農用地的政策。這些政策有明顯的錯誤，但是得以不斷加強，靠的是扼殺不同意見，嚴格控制言論，讓社會和領導只能聽到

他們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報載國家計生委的負責人宣佈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對社會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嚴加處罰。不但罰款（有的罰到幾十萬元）還要計入檔案，不得參加社會各種評獎活動。這種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據何在？名人富人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是有貢獻的。為什麼要仇視他們。計生委的人自己承認，名人富人超生是極個別的事，並不構成對人口控制的威脅。為什麼要專門針對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機敲詐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應有的公正執法的原則；如果是想煽動貧富人群之間的對立情緒，破壞和諧社會，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視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計生委被有文革遺風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擔憂的。其實，對超生罰款已經是過去的做法。現在不叫罰款了。先是改稱為計劃外生育費，現在又改稱社會扶養費。超生已經是一個中性的行為，並不認為是什麼錯誤。這些官員曲解有關規定，把它當作打擊社會精英的手段，挑撥普通群眾和精英分子之間的對立，破壞社會和諧。同時又隨意擴大自己手中的權限，增加自己的威風。這種出格的做法難免引起大家對計生委此種政策出發點的懷疑。

以上猜測政策因為官員們的個人利益而被扭曲，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因為法律意義上的證據是很難得到的。人家心裡是怎麼想的何來證據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論的，懂得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顯的片面性，懷疑就產生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員都有這種心態，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負責人是難辭其咎的。官員們否認我的指責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開放反對的聲音，讓各方面的不同意見有充分發表的機會。否則怎麼否認也是枉然。

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于軾